

王晓纯 吴晚云 主编

N

e

w

H

u

m

a

n

i

t

i

e

s

S

e

t

i

c

s

no.

新人文
丛书

感伤时代的文学

张柠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Literature in the Sentimental Age

感伤时代的文学

张柠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伤时代的文学/张柠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1
(新人文丛书)

ISBN 978-7-5133-0996-7

I. ①感…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20世纪—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74697号

感伤时代的文学

张柠 著

策划统筹: 陈 卓

责任编辑: 陈 卓 曲 辉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私制

版式设计: 刘洁琼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 × 970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一版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996-7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新人文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晓纯	吴晚云
副主编	罗学科	史仲文（执行）
	张加才	郭 涛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建嵘	马立诚	王向远	王清淮	王鲁湘
刘丽华	安乐哲	尤西林	吴 思	吴祚来
张 柠	汪民安	李雪涛	陈晓明	邵 建
赵 强	单 纯	金惠敏	骆 爽	夏可君
黑 马	熊培云	敬文东	谢 泳	戴隆斌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革	王鸿博	王景中	王德岩	曲 辉
刘永祥	孙德辉	李志强	邹建成	张卫平
张 轶	张常年	周 洪	屈铁军	赵玉琦
赵晓辉	赵姝明	袁本文	铁 军	秦志勇

【总序】

新人文：在思想与行动之间

王晓纯

“人文”一词，用法不一：古人将之与“天文”对举，今人把它与“科学”并列；它还常用来概称一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的崇扬人性与人道的主义或精神。

“人文”与“天文”对举，最早出现于《周易》。《周易·贲卦》彖辞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根据后人的解释，“文者，象也”，即呈露的形象、现象。于人而言，包括人世间的事态、状况，并可以引申到个人气象与社会风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强调“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总是与人文密不可分。人而文之，方谓之文明。在中国传统中，“人文”主要指人类社会的礼乐教化、典章制度和道德观念。而文明在其本质上，乃是人类对“人之为人”在思想上的自觉和这种自觉在实践中的表现。

“人文”与“科学”并列，与西方近代分科之学的出现与发展有关。伴随科学与技术的勃兴和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通过科学与工业革命不断推波助澜，甚至形成了科学与人

文之间所谓“两种文化”的分裂。

“人文”作为一种精神或主义，泛指从古到今东西方都出现过的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重视人的权利和自由、追求人的旨趣和理想的一般主张。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新人文是一种新愿景。现代社会使人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面前常感无力，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幸福之间往往容易失衡。新人文将目光聚焦于人本身，重塑价值理性，高扬人性尊严，唤起内心力量，促进个性自由发展，让梦想不再贫乏，让精神充满希望。

新人文是一种方法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两者的分隔也有渐行渐远之势。新人文试图重新发现科学与人文的内在融通，增进科学与人文的互补互用，让科学更加昌明，让人文之光更加夺目。

新人文是一种行动哲学。继往圣、开来学不是思想者的唯一目标，理想与现实之间需要架设坚实的桥梁。新人文力图夯实人文基础，作为社会的良知而发出公正的呼声，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让思想冲破桎梏，用行动构筑未来。

鉴于以上种种，我们编辑了这套“新人文”丛书，奉献给关心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新人文建设的广大读者。

2012.10.19

序：文学研究的精神史维度

社会分工细致发达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好处在于能够通过高度的专业化来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社会成本；坏处是制度化的劳动分工使一个人的其他方面的才能受到抑制，进而导致“劳动异化”。我对这种制度化的劳动分工有天然的敌意。我不想把一生的精力耗费在某一个作家身上，无论他是曹雪芹还是鲁迅，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希望自己尽量地随心所欲，对内心着迷的无论什么作家作品、文化现象、社会思潮，能够通过写作的方式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即便如今在高等学校从事某一专业领域的教学和科研，我的这种想法依然很强烈，尽管它不时地受到各种制约。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我经常会在忙里抽闲逃离狭义的“专业”领域，去写一本并非我的“专业”的著作，比如带有社会学或文化哲学色彩的《土地的黄昏》，比如需要求助于文学理论之外的其他理论方法的文化研究；有时候还从事文学创作，而且我坚信文学写作对人文学科研究的积极意义。

关于学术研究和写作的规范性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清人章学诚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记注”（史料，或称“当时之简”）力求方以智，“撰述”（著作，或称“后来之笔”）力求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蓍之德

圆而神”；方智以藏往，圆神以知来；严谨之德属“方”，创造之德属“圆”（《文史通义·书教》。引按：“方”与“圆”也可意指“地”与“天”；“天道”与“人事”之由阻而通曰“神”）。前者的确是后者的基础，但并不是充足的条件。一些人文研究，貌似“方智”十足，实际上不过是材料的堆砌。至于“圆神”者，更是罕见。常见的是，把与人的精神或者灵魂相关的，蕴含“灵性”的人文学科，做成了僵死的东西。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史、哲变成了互不相干的“专业”领域，缺乏一以贯之的东西；或者说，从前那种一以贯之的“道”已经疑问重重，而新的价值标准又没有成型。于是，“文”成了词语的花招，“史”成了材料的堆砌，“哲”成了权势的辩辞。当今的学界与民国时代的学界相比较，这种破败残缺的情形显得更为明显。正是“畸才汇于末世，利禄萃其性灵。……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史通义·诗教》）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好为官师”的士大夫心思依然没有改变。在“官”、“师”未分时代，士大夫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语言秩序”，以便与权势者维护“行为秩序”的做法两相配套。维护秩序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具体的个人的言论和行为，符合社会（家国）意义上的“礼”的规范。士大夫对于如何处理“文”与“质”的关系这件事情，非常在意也非常纠结，既担心“质胜文”的粗野，又担心“文胜质”的靠不住，最好是“文质参差均衡”，做到“损有余补不足”，符合辩证法，才能将合于“仁德”的品质，通过某种“形式”的“文”表现出来。可是，谁敢保证自己能将文与质的比例处理得恰到好处呢？评价标准是什么？谁当裁判？其实，当文质发生冲突时，他们就要删“文”保“质”。他们认为，“质胜文”尽管不完美，但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啊！“文胜质”呢，则有忘其“根本”的危险，所以“与其史也，宁野。”（朱熹《论语集注》卷三）。这种想法和做法至今阴魂不散。

问题在于，历史或时代的变化导致了对“质”（本）的理解的变化。我们究竟要“以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呢？这个曾经让全世界的人感到纠结的老问题，自然也曾经让中国人纠结万分。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在本质的、沉思默想的生活，与积极的、生命活跃的生活之间，进行了选择，他们选择了后者。20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开始了“以道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型，开始告别那种将“生人”之气息淹没的“天道之美”；告别那种以“贪帝王之尊，无骨肉之爱”（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卷三》）的宫廷政治为核心的家国政治生活；将貌似高度整一的、符合天道运行的家国结构（实为“沙聚之邦”），转化为“人国”。这就是“人的自觉”。人的自觉的内核，是自由选择及其相应的规则或关系；它的形式是改变那种君臣父子、恩威并施的“小儿文化”，建构一种自由选择与独自担当的“成人文化”。因此，启蒙的本质实际上是“悲剧性”的。它让人独自承担自己的命运，并由此获得一种成人化的生命感或存在感。面对这种新文化及其相应的新文学，中国人至今不大习惯，内心总有一股寻求父亲训斥、投进母亲怀抱的冲动。迷恋宫廷权斗故事和官场小说，还有歌颂温顺的动物和熟悉的植物的诗歌，就是这种冲动的潜意识动作。

对于20世纪新文学而言，“文的自觉”不应该是辞章之术，而是“人的自觉”的外显形式。整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都可以视为对这种外显形式的操练。或者说，新文学的形式史，正是新时代的精神史的外在表现。从这一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就不会固执地纠缠于作品单纯的“审美价值”的高下问题，而是从中发现一种新的“精神生态”的形成过程，发现一种稚嫩的新精神的发育成长过程。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同时担当了大变革时代的多重任务。首先，是使我们从那种古典审美迷雾中走出来，并怀着新的审美期待。第二，是将那种具有高度整一性的、同时又含混神秘的审美感知，分解到具体而生动的个体身上，也就是分解到具体的感官层面，让人成为活人，使得每一个感官的基本功能得以恢复，让它们能够正常地看、听、触、嗅、尝、行，让它们得以首先恢复到人类学层面，由此转而进入社会学或美学层面，这些都是“质”的外显形式，或者说就是“文”的内容。第三，是实践或者重构新的美学规范，也就是属于“体”（体制，格局）的部分。对于诗歌而言，就是在新词法、新句法基础上的新意象体系的建构（见本书《中国节奏与精神秘密——古诗的遗传基因和新诗的遭

遇》一文)。对于小说而言，则是对现代叙事结构的探索和转型，这不仅仅是指单纯技术意义上的“布局结构”，更重要的是与“质”相关的“意义结构”（见本书中的《张爱玲与现代中国的隐秘心思》一文中对“现代小说结构”问题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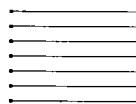
新文学运动中所产生的问题或者说不足，是小节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白话汉语文学的生产与公众接受之间的巨大反差，其改变也需要时日。我对白话文学的发展充满期待，而且在文学研究和评价过程之中，我主张“大文学”的概念。也就是说，“文学”不只是局限于技术或者文体层面的诗歌、小说、散文概念，它是通过语言符号（纹样）呈现出来的时代精神气质。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分支，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形式史研究的路径，呈现出精神史的演化过程。因此“质”—“文”—“体”三者之间的演变历史或互动关系，是文学研究从形式史走向精神史的基本前提。

2012年7月20日

目 录

序：文学研究的精神史维度	001
第一辑 讲故事的人	001
张爱玲与现代中国的隐秘心思	002
一个时代的文学病案	061
文学与民间性	
——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	075
史铁生小说中的东方美学	
——论《务虚笔记》	103
词语的复活与散发	
——论《马桥词典》	116
第二辑 幽暗的诗歌	131
中国节奏与精神秘密	
——古诗的遗传基因和新诗的遭遇	132
我们内心的土拨鼠	157
《零档案》：词语集中营	184
飞翔的蝙蝠	
——翟永明论	202
酒的诗学	220

第一辑
讲故事的人



张爱玲与现代中国的隐秘心思

一、引言

张爱玲^①《金锁记》开头，是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文字：“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月亮——这个中国人千百年来了然于心、永恒不变的熟悉意象；这个能消除空间阻隔、并将亲人联结起来的万能意象，

^① 张爱玲（1920～1995），原名张煊，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祖籍河北丰润，1920年生于上海。祖父张佩纶为晚清名臣，祖母为李鸿章之女，外祖父为湘军将领之子。少年时代父母离异，母亲长期游走海外。与父亲决裂之后，姑姑为其监护人。青少年时代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生活，中学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大学毕业于香港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1944年前后因短篇小说集《传奇》而轰动上海滩，成为职业作家。曾与胡兰成私订终身（1944～1946），1952年移居香港，1955年移居美国，与美国作家赖雅结婚（1956～1967），1995年病逝于洛杉矶。

已经变异甚至消失。“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的月亮变得陌生起来了。因为它突然跟“三十年”这个现代时间意义上的“短时段”搭配在一起；跟茅盾在《子夜》中形容为“怪兽”的骚动不安的现代都市拉扯在一起。它看起来好像离人们更近了，实际上却更加遥远。物是人非的、变化的“三十年”，比恒久的千年要漫长得多，老年人因此感到“凄凉”。年轻人对“三十年”的感受，更是陌生而且朦胧，“月亮”已经变成跟冷漠的“城市”和“人”一样，不可亲近，天各一方。他们于是便派出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泪珠，并用“朵云轩信笺”做载体，试图与月亮去做无望的约会。整个一段文字，透出历史废墟和现实生活的双重荒凉感。月亮（意象）、时间（历史）、人（家庭），一切都出了问题。但人们就像白公馆的使女一样不明就里，只顾津津乐道于服装、饮食、金钱、权力。现在看来问题不小，但为什么一直被搁置了几十年？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20多年，中国大陆的大学生对张爱玲的迷恋，要远远超过我们此前对鲁迅的迷恋，张爱玲也成了学位论文的重要选题对象。有一位学生曾经很认真地对我说：老师，求求你，不要每次上课都提到鲁迅好不好？我说：你希望我提到谁呢？她说：讲讲张爱玲也好啊。我问：为什么？她说：鲁迅与你们相关，张爱玲跟我们相关。我感到诧异且纳闷：难道鲁迅跟她们就不相关了吗？问题背后的原因的确很复杂，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鲁迅”是我们灌输给她们的，“张爱玲”是她们自己选择的。后来有一次在课堂上，我试图引用张爱玲一句话，但一时语塞，只说出了其中几个字，学生们却几乎异口同声把那句话说了出来。他们对鲁迅的《野草》恐怕没有这么熟悉。在他们的高中时代，就有顺口溜在同学间流传：“一怕学古文，二怕周树人。”这里所说的“怕”，一是鲁迅成了他们考试的材料，因而害怕并产生逆反心理；二是鲁迅文章的腔调多少有点古怪，表达的多是“反常化”的、陌生化的经验。而张爱玲所写的，都是饮食男女的日常情感，“传奇里面的普通人”或“普通人里面的传奇”。就目前的学术“气氛”而言，迷恋鲁迅，可以冠冕堂皇；迷恋张爱玲，多少有一点风险。对张爱玲的评价，大陆主流学术界一直保持谨慎的沉默，即使开口，基本上是用鲁迅打压张爱玲，或者要将张爱玲列入通俗文学的

行列。相反的情形是，在海外华裔学者和港台学者那里，“张爱玲研究”已经成了“张学”，与大陆文学研究显学“鲁学”相呼应。

对张爱玲的研究，发轫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上海，翻译家傅雷、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国学家柳存仁、小说家苏青、学者胡兰成等人，是最早的研究者，但有系统见解的文章并不多，迅雨（翻译家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算是代表。^①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几代海外华裔学者的研究和推介，最后在台港学术界和创作界，掀起了研究和模仿张爱玲的热潮。这一热潮，很快波及到了大陆，特别是青年学界。围绕在“张学”周围的，是各种规格的跨国学术研讨会和出版热，以及大众传媒相关的介绍和大批读者的追捧。目前，“张学”研究中心依然在海外或者港台，大陆学界处于陪衬地位。不过在资料发掘、整理和出版方面，大陆并不落伍，做了大量有效的基础工作，比如，张爱玲“全集”^②和多卷本“阅读张爱玲书系”^③的出版，还有多种张爱玲传记问世^④。基础资料大致完备了，但“张爱玲研究”大多停留在“都会传奇”，“苍凉风格”，“民国才女”，“格局不大”，“不如鲁迅”这一类感觉层面，否定者和肯定者的水准，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温儒敏指出，读者不能深刻理解张

① 20世纪40年代关于张爱玲的评论文章，收入陈子善编的《张爱玲的风气》一书。傅雷在肯定《金锁记》和部分肯定《倾城之恋》的同时，宣判了《连环套》之后所有作品的死刑，相当于判处24岁的青年作家张爱玲的“死刑”。李欧梵在《张爱玲：沦陷都市的传奇》一文中认为，傅雷的否定性观点，主要是从道德角度入手。胡兰成的评论，有明显的吹捧之嫌，相当于一封“学术版求爱信”，但偶尔也有不俗的见解，否则怎能入张爱玲的法眼。

② 所谓“全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2009~2011），止庵主编，13册，缺《秧歌》、《赤地之恋》等，“外集”系列已出3卷，两书系合计约330万字。此外还有安徽文艺、花城、哈尔滨等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文集，版权或者编辑技术不甚规范。大连出版社1996年出版《张爱玲全集》16卷，遭查禁。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5年出版《张爱玲小说全编》，收入《秧歌》和《赤地之恋》，但做了删节。

③ 书系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2004~2006），陈子善主编，收入刘绍铭等：《再读张爱玲》，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陈子善：《记忆张爱玲》和《张爱玲的风气》，水晶：《替张爱玲补妆》。史料总评性类著作还有，司马新：《张爱玲在美国》（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陈子善：《作别张爱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说不尽的张爱玲》（上海三联书店，2004），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等。

④ 已出版的张爱玲的传记有：于青的《天才奇女》（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余斌的《张爱玲传》（海南国际出版中心，1993），孔庆茂的《魂归何处》（海南国际出版中心，1996），宋明炜的《浮世的悲哀》（上海文艺出版，1998），费勇的《张爱玲传奇》（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刘川鄂的《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等。

爱玲作品中的复杂部分，即便是大学精英也不例外，“少有读者能够深刻理解张爱玲作品中‘惘惘的威胁’”。^①大陆“张爱玲研究”^②，首先必须面对两个难题：一是海外或港台学者已有的高水准研究成果，二是大陆“中国现代文学史”话语的局限。本文就以这两个问题为基本起点，将张爱玲的创作，包括叙事、文体、主题等，纳入文学观念史的视野，试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寻找另一个逻辑起点，以便为“无法安放”的张爱玲挤出一点空间；同时，还想顺便发掘那些被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主流话语压抑的、却在人们心中潜藏着的隐秘心思。

二、张爱玲研究的问题史

夏志清1957年在台湾的《文学杂志》（夏济安主编）发表《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评“秧歌”》两篇评论，超越了此前写得最好的、傅雷关于张爱玲的评论。这两篇文章收入196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③，成为第15章的主干。夏志清第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专章讨论张爱玲的生平和创作，并使张爱玲超过鲁迅成为个人章节占据篇幅最大的作家。夏志清的研究，涉及张爱玲20世纪50年代之前所有重要作品，从《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到《秧歌》和《赤地之恋》。他不但将张爱玲提到与鲁迅比肩的位置，还认为张爱玲与英美文学界一些著名女作家相比也不逊色，有些地方甚至还要高一筹。此外，他将微观细读的眼力（对20世纪新批评的方法的运用），与宏观判断的眼界（中外文学素养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相结合的方法，已经为张爱玲研究界所熟知。

① 温儒敏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 大陆的张爱玲研究的基本状况，可参见温儒敏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1～367页。

③ 该书1961年初版为英文，1979年香港友联出版第一个繁体中文版，1985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繁体中文版，2001年香港中大出版社增订版，2005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大陆简体字版（有增删，张爱玲一章繁体字版为38页，简体字版为27页，增加了夏志清新写的序言和刘绍铭和王德威的评论）。

夏志清的研究也遭到了严厉批评，有代表性的批评声音，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中国文学专家亚罗斯拉夫·普实克（1906~1980）。普实克1962年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严厉批评夏志清，认为他的这部著作的特点是“教条式的偏狭和无视人的尊严的态度”。夏志清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一文作为回应。^①为了不偏离本文主旨，我不准备详细讨论两位教授的观点。但我喜欢普实克教授开门见山的态度，因此我也开门见山：我对普实克教授所谓系统科学地“发现客观真理”的研究方法，以及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判断和趣味表示怀疑，并认为他给夏志清教授所扣的帽子，特别是“教条式的偏狭”那顶帽子，戴在他自己头上更合适。我不是说夏志清的研究方法是唯一有效的，他那种以“审美批判”替代“文学史写作”的方法值得商榷。但夏志清的研究撕碎了此前的“文学史”貌似严谨科学的结构，打破了普实克所附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鲁郭茅巴老曹，外加丁玲树理赵”的格局，唤起了人们重写文学史的冲动。它至少让我们重新开始面对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面对曾经被删除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作家，面对被肯定的作家那些被忽视的作品（比如老舍除了《骆驼祥子》之外还有《猫城记》）。夏志清的取舍原则，可以视为带有“拓扑学”（Topology）思维色彩的原则：被删除的就增加，关注太多的就减少。它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起，共同保持了“文学地形图”的完整性。一部“小说史”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很可贵了。试图简单粗暴地否定它的人，结果只会被它自身的反弹力击倒。

刘再复对夏志清的批评比较客观平和。他肯定夏志清对张爱玲艺术风格的基本评价，比如“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对于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揭发”等，同时提醒要从“鲁迅神话”的制造中吸取教训，避免再造“张爱玲神话”。不过，“张爱玲神话”即使存在，也与“鲁迅神话”不同，这是民间“造神”与官方“造神”两种“造神运动”此消彼长的结果。此外，刘再复对

^① 两文收入普实克：《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李欧梵编，郭建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这本论文集曾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书名《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等译，李欧梵的序言不变，没有附录部分）。